

Wangmingsheng Jiqi 《Shiqishi Shangque》

王鸣盛 及其

《十七史商榷》

● 刘玲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徐州工程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

刘 玲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清代乾嘉考据学家王鸣盛的扛鼎史著——《十七史商榷》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十七史商榷》的考证成果以及分散在书中各处的议论进行了提取、归纳、概括、分析、总结,证说了《十七史商榷》的“史”“论”相兼的特点以及在文字训诂、校勘、版本、目录等文献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客观公正地评价了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刘玲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5646 -0167- 6

I. 王… II. 刘… III. ①中国—古代史—纪传体②十七史—研究 IV. K20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7731 号

书 名 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

著 者 刘 玲

责任编辑 张怡菲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内 邮编 221008)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排 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2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我对历史文献学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课务繁重，一直没能静下心来做这方面的研究。2004年，我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攻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方向是传世文献。随着对古代文献的广泛涉猎，清乾嘉时期一些考据史家及其著作成为我关注的重点。最终我选取了乾嘉三大考史大家之一的王鸣盛以及他的史作《十七史商榷》作为我研究的重点，并确定了《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作为我学位论文的选题。

王鸣盛作为乾嘉吴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具有多方面成就，一生勤奋向学，手不释卷，著述颇多，当属被研究的重点。《十七史商榷》是王氏的扛鼎之作，耗时近30年，博大恢宏、考证细致、论说精到，虽名为《十七史商榷》，实际论及十九正史，在论说过程中征引的书更是不计其数，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四史札记》齐名，成为三大考史名著之一，王鸣盛及其著作理应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

《十七史商榷》问世后，确实也受到过很多人的关注，如钱大昕、王昶、江藩、赵翼、周中孚、李慈铭、支伟成、梁启超、陈垣等大家对《十七史商榷》皆有论及。但实事求是地说，与同时代的考据史学家钱大昕和赵翼相比，对王鸣盛及其著作的研究还是显得相对薄弱。专门研究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的专著至今还没有，专门研究的文章也不是很多，有很多只是散见于对清代思想、学术和对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四史札记》的比较研究中，以王鸣盛学术之突出、特色之鲜明，这种研究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为笔记式体裁，以随笔记录为主。其结构大体上包括“序”、“正文”、“缀言”三部分。“序”阐述其“商榷”意旨，委婉表达出治史宗旨，是《十七史商榷》不可分割的内容。“正文”是对自《史记》迄《新五代史》凡 19 部正史的考释和评论，为全书的主体。“缀言”二卷讨论史书体例及相关问题，特别是对《资治通鉴》的评论，对正文起到了很多的补充作用。

作为考史著作，《十七史商榷》“改讹文，补脱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释蒙滞，审核舛驳”，考据内容几乎占了全书三分之二。皆为纠正文字错讹，补充文字脱漏，校出史书衍文，特别注意对地理、典制的考订，王鸣盛自言“一切典故无所不考，而其所尽心者，地理也”，事实也确实如此，《十七史商榷》中集中讨论地理者多达 15 卷，而典制的考证亦随处可见。

史论是《十七史商榷》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七史商榷》的特色。史论是王鸣盛在考辨过程中做出的，与考证内容相穿插。王鸣盛虽然宣称“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强调考证“典制之实”、“事迹之实”，反对“驰骋议论”和“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但他真正反对的是明代以来的空疏学风以及不顾事实的“无根之谈”，对于考证基础上“议论”、“褒贬”，则被看成是史家之所需。对各史得失、史家素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议论褒贬在《十七史商榷》中随处可见，考史与论史不仅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

在《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还提出了很多关于文献研究和史籍编纂方面颇有见地的观点。他强调校勘的价值，以为“读书必先精校书”；看重文字训诂，视为治学的门径；而“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事”；对于各种版本“宜择善而从”。对史籍编纂，如体例、文字、书法义例以及史料的选择等方面也发表了一些看法。这些观点对于了解乾嘉时期文献理论、全面评价乾嘉学术成就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十七史商榷》的学术“致用”功能非常明显：校勘文字讹讹，考证疑难，为后人读史、治史提供方便；“考”“论”兼具，大量史法、史事评论，给史学研究带来了多方启迪；论蒙解滞，总结如何读书、如何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方法以及关于史书体例、叙史的简繁和史书的撰写方法，对引领后学帮助极大，“足为读史者之津寄”，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并加以继承。

学术界发表的相关文章以及黄曙辉点校、上海书店 2005 年版的《十七史商榷》，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和基础（本书注释中的《十七史商榷》即为此书）。本书想通过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展开对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作一较为系统的研究：

一、王鸣盛的时代及其著作。主要讨论乾嘉时代及其考据特点，考察王鸣盛生平活动，总结其著作及学术成就。

二、《十七史商榷》的体例与结构。讨论体例、结构及其特点，分析“商榷”的真正含义以及《十七史商榷》一书的主旨。

三、《十七史商榷》的考证。讨论其考证内容及其特色，总结该书在考据学上的成就。

四、《十七史商榷》的史论。考察史论的形式、内容以及史论的特点，并以此分析王鸣盛的思想倾向。

五、从《十七史商榷》看王鸣盛文献学及历史编纂的见解。通过剖析王鸣盛在文献学上的观点，探讨其关于历史编纂的看法。

六、《十七史商榷》的研究方法。对王鸣盛治史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归纳法、比较法、专题研究法以及调查法等是《十七史商榷》的常用方法。

七、《十七史商榷》的评价。结合学者的评论，考察《十七史商榷》的成就及其存在问题，对《十七史商榷》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定而成的，学位论文从选题、资料收集、研究展开到定稿都是在安徽大学张金铨教授精心指导下进行的，在此，请允许我向张金铨教授表示最诚挚的感谢！铭

感在心的还有在我学习和论文写作期间，陆勤毅教授、何琳仪教授、王鑫义教授、刘信芳教授、吴春梅教授、张子侠教授、周怀宇教授、卞利教授、栾成显教授给予的指导、帮助，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感谢在我读博期间给我各种帮助的所有师友，恕不一一具名。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

本书由徐州工程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刘 玲

2008 年春于彭城

目 录

绪论	1
一、研究的缘起	1
二、研究综述	5
三、研究内容和重点	10
第一章 王鸣盛的时代及其学术	13
一、乾嘉考据之风的兴盛	13
二、史学的发展与考据学	31
三、王鸣盛的生平与学术著作	37
第二章 《十七史商榷》的意旨	57
一、“商榷”释义	59
二、著作结构	66
三、著作特色	73
第三章 《十七史商榷》的考据(上)	79
一、校勘文本	79
二、考证记事	89
三、辨明地理	92

四、考辨典制	100
五、考辨时间、年代	108
六、诠释解滞	111
第四章 《十七史商榷》的考据(下)	118
一、校勘记简单明了,不作无谓征引	119
二、考证细致,有疑则阙	120
三、勘正舛谬,追溯源流	122
四、广引佐证材料,注重金石证史	122
五、借助深厚知识储备,综合运用校勘方法	124
第五章 《十七史商榷》的史论	130
一、王鸣盛的“议论”“褒贬”观	130
二、对于史书、史家的评说	138
三、关于历史人物的评论	153
四、对迷信和因果报应说所持立场	162
五、史论形式	165
第六章 《十七史商榷》的文献学见解	169
一、关于文献整理的看法	169
二、关于史书编纂的见解	180
第七章 《十七史商榷》的研究方法	201
一、归纳法	201
二、比较法	208
三、专题研究法	217
四、调查法	221

第八章 《十七史商榷》的地位与影响·····	224
一、学者评语·····	224
二、《十七史商榷》成就·····	227
三、《十七史商榷》存在的问题·····	239
参考文献·····	246

绪 论

历史典籍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工具,也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浩瀚的历史典籍进行整理和研究,出现了一大批成绩卓著的考史大家和考史著作。对乾嘉历史考证学,当代史家瞿林东曾有较高的评价:“18 世纪的中国史学以其著名史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历史考证,久负盛名,其影响所及直至于今。……就整体与主流来看,18 世纪中国史学的历史考证之学,实是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①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不能不加强对乾嘉考据史学的研究,当时最赋盛名考史学家及其著作是:钱大昕及其《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赵翼及其《廿二史札记》。本书就是对其中之一的王鸣盛及其考史著作《十七史商榷》进行系统研究。

一、研究的缘起

乾嘉年间是考据学的极盛时期。近代学者梁启超在其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夫无考证学则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②。乾嘉考据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影

① 罗炳良:《18 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08 页。

响、学术趋势推动、典籍整理要求等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王鸣盛(1722~1797年)作为乾嘉时期吴派重要人物,不但像其他乾嘉学人一样考经,而且把很多精力用于治史,移经考史使其考证更显细致、缜密。王鸣盛对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二十四史中的19部正史进行了细致研究,最后著成博大恢宏的《十七史商榷》。全书一百卷,前后耗时24年,虽名为《十七史商榷》,实际论及十九正史,在论说过程中征引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十七史商榷》对19部正史中外缪的考辨成果、匠心独具的史学评论以及关于文字、训诂、校勘、版本、目录等文献学方面的观点不仅对后学的学习、史学典籍的利用提供了极大帮助和直接的方法指导,而且对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从传承和研究古典文化的角度来看,不能对《十七史商榷》这样的重要典籍视而不见。王鸣盛作为乾嘉吴派的重要人物,《十七史商榷》作为考史名著,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与同时代的考史学家钱大昕和赵翼相比,学术界对王鸣盛及其著作的研究相对薄弱。近年来,对钱大昕和赵翼的研究专著陆续问世,主要有: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诗铭所著的《钱大昕》,1996年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顾吉辰主编的《钱大昕研究》,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记录著的《钱大昕的史学思想》,2006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涛和邓声国的《钱大昕评传》,1983年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马昭之、杜维运的《赵翼传》,200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兴勤的《赵翼评传》,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白兴华的《赵翼史学新探》,等等。尽管屡有学者提到要加强对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的研究,涉及该书的研究论述也有日渐增多的趋势,但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的论著问世。我想,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多种,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人们对该书的学术内涵及其特色缺乏认识:论考证之

精审,《十七史商榷》不如《廿二史考异》;论对史事的综合及议论,《十七史商榷》又不及《廿二史札记》,其研究不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赵翼《廿二史札记》彰显,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了。另外,王鸣盛为人不够谦虚,好出狂言,以学问博赡睥睨一世。他赠钱大昕的诗中自称“江东无我独卿驰”^①,以学问“天下第一”自居,且自负和狂放不加任何掩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学术成就和地位的评价。但如果抛开王鸣盛的自负,实事求是地审视其人其著,则不难发现王鸣盛确实是位博学淹通的学问家,其《十七史商榷》也确实有很多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地方。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既有浓郁的考据色彩,又不乏对史学理论的构建;既体现了乾嘉时代的史学特色,又表现出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历史学本身是以已逝的人类过去的客观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人们要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和遥远的历史,主要凭借史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史料与其所记载的社会历史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很难完整、准确、客观地反映实际。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亡佚、讹误等时有发生,又加剧了史料与史实之间的矛盾。因此,要客观地把握人类社会的过去,要研究遥远的历史,历史学家就必须首先收集、整理、考证、剖析史料,考据学产生及其发展势所必然,并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历史学同时还具有对历史作出因果解释,并进而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责任。所以梁启超说:“吾非谓治史学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巧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远吾思想,骋吾批评”。^② 所以,完整的历史学应既包括历史考据考证,也包括

^① 王鸣盛:《西庄致竹汀书》,见《历代名人尺牍》,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史事分析和评论。在乾嘉三大考史著作中,钱氏更重考据,乾嘉时代特色浓郁,但史论稍显不足,历史学“经世致用”的功效减弱;而赵氏更重钩稽史事,多了一份史论元素,但乾嘉考据特色体现不够突出,时代色彩淡化。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对两者都有所体现,即既反映了考据的学术氛围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体现了历史学研究本身发展的要求,所以,作为乾嘉这一特定时期的史学著作,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更具代表性,正如台湾史家杜维运所言:“乾嘉时代学人之治史,王氏最足为典型人物”。^①梁启超也说:“清代一般史学家思想及其用力所在,王西庄之《十七史商榷·序》是足以代之。”^②

王鸣盛的不同凡响还表现在:第一,虽身处于清廷文化专制统治的环境下,王鸣盛却有着独立的史学意识,发扬了前代史家把治史与关心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传统。虽然他没有直接讨论现实问题,但他借助历史问题寄托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他对历史上的革新人物大加称颂,表现出了其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心和正义感。第二,王鸣盛具有与陈规旧见斗争的勇气。对于史书中大量充斥的主观臆断和曲笔伪托以及世代相袭的偏见,王氏敢于破除传统旧见,努力探求历史的真相。第三,王鸣盛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学者那样沉醉于烦琐考证,而是能注重思想性,评论史事,探求和阐发有意义的历史问题。第四,王鸣盛重视学术的“致用”性,努力使自己的学术成果成为指导后学的工具书,实现其“惠学”、“致用”的治学目的。

除此之外,《十七史商榷》在内容结构的布局上也体现了创新,全书分为序言、正文、缀言三大块,《自序》介绍了文章主旨,《缀言》论说了与十七史相关的许多书籍、阐述了许多观点,虽明为“缀”

① 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5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

言,实为《十七史商榷》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王鸣盛的很多观点能在考史著作中得以充分表达,正是得益于著作的这种结构布局。在校勘考证的基础上,把考评史家得失、考释典制事迹有机地结合起来。

所以,对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进行认真研究,不论是对于清代学术研究,还是对于全面评价清乾嘉史学、继承乾嘉史家的治史思想,弘扬其理性精神、促进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都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综述

《十七史商榷》的编撰始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完成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历经24年写成,其间王鸣盛吃尽苦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毫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去,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①。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如此艰难写成的《十七史商榷》,王鸣盛自己特别看重,他在自序中这样言道:“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缪葛,地理职官,眼昧心瞽,试以予书为孤行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以予之识暗才懦,碌碌无可自见。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则予怀其亦可以稍有自慰矣夫!”这些话虽以自谦的语气说出,但我们不难看出他按捺不住地自炫、得意之情,《十七史商榷》是他的得意之作。

① (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序》,上海书店2005年版。

王鸣盛学术研究是从治经开始的。其经学成就及其学识一直被当时学界所认可和重视,这一点从清人著作中有所体现。清人著作涉及王鸣盛及其学术的主要有:黄文湘编《王西庄先生年谱》;石钧著《王鸣盛传》,在《清素堂文集》中收录;钱大昕所著《潜研堂文集》中收录的《王鸣盛墓志铭》一文,对王鸣盛的生平及学术给予了客观评价;王昶《春融堂集》中,有《王鸣盛传》;钱林《王鸣盛传》,载于《文献征存录》卷四中;李元度所撰《王西庄先生事略》,收录于《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中;江藩《汉学师承记》中有《王鸣盛》篇;《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儒林下》有《王鸣盛传》;还有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等对王鸣盛及其学术都有论及。进入近代,涉及王鸣盛的相关研究又有不少,如《清史稿》中有《王鸣盛传》,徐世昌《清儒学案》以及唐鉴《清学案小识》,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以上所提到的传记和文章多从其才学及经学成就着眼,对其史学成就未有过多关注。最早重视王鸣盛史学成就的,当推钱大昕,他对《十七史商榷》给予过这样的评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独不善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实用也”^①。另一个是李慈铭,他的见解与钱大昕的不尽相同,他认为“此书与钱书则钩稽抉摘,考辨为多,而议论淹洽。又非钱之专事考订者比矣”。“钱书考订,鲜及议论;赵主贯串,罕事引证;兼之者是书,故尤为可贵”。^②再后来,余嘉锡在其《王西庄窥圆图记》一文中,也论及了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对大量语言文字知识和文献学问题,如音韵、训诂、目录、校勘、辨伪等的涉以及考证中杂有的大量的治学方法

^① (清)钱大昕著,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卷48《西庄先生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39页。

^② 王利器辑:《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0页。

心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等,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十七史商榷》的研究,涉及王鸣盛及其史著的论文也逐年增加,如《中国史学家评传》载有来新夏撰写的《王鸣盛》传记,张舜徽《清代文集别录》以及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家小传》也对王鸣盛的生平及学术予以评述,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对王鸣盛及其学术成就有较详细的分析,王记录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中有相关涉及,郭康松的《清代考据学研究》中对王鸣盛也有提及,最近出版的罗炳良的《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中的第七章专门论及王鸣盛和《十七史商榷》。有些虽散见于对清代思想、学术史研究的著作中,但其中相关论说非常深刻。如陈其泰《王鸣盛史学:朴学家的理性探求》(收入《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林出版社1999年版)认为,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无论是对一系列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从论楚汉相争策略的得失、司马谈父子学术思想的异同到汉代的刺史制度、口赋和常平仓,还是对晋唐间若干重要的政治史问题、陈寿和范曄等重要史家的思想倾向以及总结著史的直笔要求和史料运用等的论说,无不折射出理性的光芒,作为一名考据学家能做到这一点尤为可贵。再如,在张新民所著的文集中,收录了《王鸣盛史学的实证特征及其价值观》(《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论述王鸣盛史学的实证特性和崇实的价值观。王鸣盛在史学研究方面能远拒“《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近斥朱熹《通鉴纲目》和宋儒议论法戒,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探求考辨真伪的实证研究方法,这种一般学人所不能言和不敢言的史学卓识非常难得。台湾学者杜维运是研究清代史学家的著名学者,1984年出版的《清代史家和史学》既有对清代史学和乾嘉史学整体群貌的概括和评述,又有对清代史家的个案研究,其中对王鸣盛生平学术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评说。

此外,学者在对钱大昕及其《廿二史考异》、赵翼及其《廿二史